

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

贺跃夫

著

——兼与日本士族比较

广东人民出版社

序

陈胜旻

从业于人文学科的学者大多知道，在未经前人开垦的处女地上拓荒是艰难的；在前人已作出成就的熟地上再作耕耘而要有新的贡献，也同样不易。贺跃夫同志的这本《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研究的课题显然不是无人涉猎的新领域，诚如作者自己在本书前言中指出的，士绅研究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就是一个受到中外学者重视的重要课题，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著。但本书从一个新的视角着眼，侧重于考察士绅群体与近代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在这一领域作出了新的有益探索。

作者在本书中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在近代动荡的社会变动的环境中，晚清士绅群体发生了哪些变化？近代社会的变迁怎样引起士绅群体的演变？而士绅的演变又怎样影响着晚清社会变迁？本书系统地考察了晚清绅权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士绅群体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动。贯穿全书的有两条主线，或者说两对辩证的变项，其一是传统与近代的关系，其二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从第一对变项来看，本书把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变化因素，

诸如因人口增长、朝代衰落、商品经济发展等等而引起的传统体制内的变动，称之为传统内变迁；而把主要因为西方的挑战及其所引起的超越传统格局的社会变迁，称之为近代变迁。从这个视角着眼，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朝代衰落的传统历史变局，与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变局同时出现，士绅面临这种内忧与外患相煎的形势，他们为应付这一历史变局，传统内变迁与近代变迁交织在一起。本书着力考察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年士绅的演变动态，认为19世纪末以前，士绅群体虽然因太平天国等运动的冲击而出现了若干变动，但大体上仍局限于传统内变迁。然而，晚清的重大变局，又为近代化变迁创造了历史前提。当时，事实上已出现维新变革的思想主张，只是由于文化与政治的一体化结构阻碍了士绅对近代新知识的接受；同时，因其切身利益所在，士绅的社会关注核心始终仍是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注重于团练与地方治安。因而，直至19世纪末以前，维新变革主张很难从士绅群体中找到足以将其付诸实行的社会力量；20世纪初年清朝新政的推行才启动了士绅迈向近代变迁的步履。作者分别探讨了士绅在文化教育、立宪与地方自治、新兴工商业等几个方面的新动向，这些新的动向，其主流是离异传统体制，走向近代化。但作者也指出，清末士绅的演变带有很浓厚的历史过渡时期的特征。新的变革总是与传统扭结在一起，难舍难分。如清末的地方自治与固有绅权、新式学堂与旧学、公司商会等新的经济组织与士绅名流传统权势及经济活动等等。传统延续与近代变迁是近代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一对重要因素，如何辩证地把握二者的关系，是正确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过去一些外国学者曾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忽略了它在近代的社会演变进程；而近年不少学者在探

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时，又往往强调了近代性的变动，忽略了传统的延续及其影响。本书在探讨晚清士绅的演变时，注意将传统内变迁与近代化变迁结合起来考察，辩证地加以分析，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士绅群体的演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述。

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社会阶层（本书把他们视为前近代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演变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关系密切。本书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着眼，指出士绅的演变一方面是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反映，另一方面，由于士绅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们的动态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绅权的演变主要是由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使然，但藉团练而起的绅权的膨胀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晚清的社会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一个已为不少中外史学家所注意到的问题。清末新政的推行促使士绅发生另一次巨大的变动，适时而变的士绅，在清末的教育、政治与经济变革中进一步扩大了在地方的权力，成为地方学务、宪政与地方自治、商会及公司等组织领导者，因而对清末的近代化社会变迁继续发挥了重大影响。本书具体地分析了士绅在清末各行各业中的动态及对新变革发挥的正负影响，并进而探讨了中国近代化受损的原因，在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有其特色。作者以日本士族为参照系统，在分析晚清士绅的变化、局限及其原因时，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较成功地说明了晚清士绅为何难以完成近代化变革的历史使命。另外，本书侧重于结构及功能分析，抓住晚清士绅所能控制的社会、文化教育、政治与经济组织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加以阐述，并尽可能地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使其论述能落实到实处，有根有据，不至空言无物或泛泛而论。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成功之处。

一本好的史学专著，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在这一方面，作者用力甚勤。据我所知，作者着手研究士绅问题，起始于十年前，那时他刚考上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由陈锡祺教授与我指导，即选定以《清末广东士绅》为硕士论文题目，开始收集清末筹办地方自治、立宪及地方学务等方面的官私文献，搜集了一些当时还鲜为人利用的清末文献。此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一专题的研究，逐渐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做博士论文时，又获机会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师从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名家狭间直树教授，有机会更广泛地搜罗本专题的史料及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因此读者可以发现，本书的立论都建立在扎实的论据基础之上，或者是经过作者统计整理的数据；或者是一些典型的个案；一些有争议的史实，作者还进行了考证与清理。这种注重实证的严谨学风是值得肯定与发扬的。

本书的研究课题是一个大题目。这本24万字的专著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但显然还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不少重要的方面，如士绅与反洋教斗争、绅权与宗族等等书中均没有展开讨论；书中已论及到的某些内容，如士绅在辛亥革命中的动态等，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丰满。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值得专业研究者与史学爱好者一读的有份量的专著。作者的博士论文写出后，已受到有关专家的重视，参加评审及答辩的陈锡祺、龚书铎、李时岳、狭间直树、林增平等教授均给予较高的评价，肯定作者对士绅群体在近代的整体动态、士绅与晚清近代化变革的相互关系、地方绅权的结构演变等方面的论述，均取得新的进展，富有创见。因而，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以欣喜的心情，写下这篇“导读”式的序；并期望跃夫同志再接再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前 言

在中国历史上，士绅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群体，构成传统儒家社会中的中坚阶层。西方学者甚至称中国为“士绅之国”，认为这个阶层决定了中国的命运^[1]。自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就把士绅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中国历史上士绅的产生、流变、社会地位及作用进行过研究讨论^[2]，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版的张仲礼著《中国士绅——对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及其姊妹篇《士绅的收入》与何炳棣著《中华帝国的进身之阶——社会流动方面，1368-1911》，在学术界颇著影响。前者对19世纪士绅的构成、社会地位、特权、作用以及士绅的经济地位与收入作了详尽的描述和统计分析；后者则从社会流动方面考察了明清士绅的来源、晋升的途径、影响流动的因素等等^[3]。这些著作迄今仍是研究士绅问题的重要参考书籍。

近三四十年以来，士绅群体亦引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研究兴趣。在近代中国的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传统士绅群体的动向或演变的态势，不仅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折影，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变迁的迅速及深度与广度。因而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注重的是士绅在近代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影响。一位晚

清史研究专家在 1970 年出版的一本研究团练问题的专著中即曾提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动荡的数十年间，有多少士绅适应变动的环境而使自已生存下来？这一适应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士绅阶级的特性？他们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化的环境等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4]。自然，由于研究的视野、方法和掌握的史料不同，近代史研究者们对士绅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演变及作用的想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近 30 年来出版的有关士绅的主要论著，可概括为三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的士绅观。

第一种观点把晚清士绅基本上看成是一种地方上的保守势力。19 世纪中叶以后，士绅负担起更广泛的军事与行政责任，牢固地控制了地方一级政府，而且在经济上依赖这些管理职位。因此，当清政府实行新政，试图扩大其行政管理范围时，他们便感到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辛亥革命可以理解为“谋求改革的满清王朝同大多数情况下是保守的地方士绅阶级之间互相斗争和紧张关系的产物。这些地方绅士阶级，把朝廷颁布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新政措施视为对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挑战”^[5]。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作为保守势力的地方士绅，在清朝走向衰亡之际，解除了法律义务与习惯的束缚，抓住机会扩大其地方权益。他们在清末的立宪中伪装成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伪装成革命派，从而度过了难关，成功地维持现状至 1949 年。因此，辛亥革命在地方士绅的控制下，也就只成了一场“朝代革命”或汉人反满的“种族革命”^[6]。

第二种观点与上述看法相反，把清末士绅视为跟上时代潮流的进步势力。他们认为，在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士绅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在 1905 年废除科举以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职业，几

乎每一个士绅家庭都有激进学生或新军军官，或近代企业的投资者，因此，士绅成为跟上时代潮流的进步势力，对清末的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影响^[7]。中国学者近年来一些关于士绅的论述，也颇多侧重这一阶层在清末的趋新趋向^[8]。

第三种观点则试图揭示晚清士绅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分化。陈志让教授即曾指出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分化的趋向，“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军队，与军人结合，要求共和；有的与秘密结社联络来推翻清室；大部分则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9]。一些优秀的区域研究，或以城乡，或以中地与边陲为线索，把各地的士绅描绘为不同的层次，他们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响应与演变的迟速不同，对变革和革命的态度不一^[10]。

上述研究大多注目于清末最后一二十年间的政治变革中的士绅，尤其是他们在清末维新变革及革命运动中的变化及作用。这种短时段的透视虽然可以展示重大政治事变中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动态，但任何变革都同时包含着对传统的改造与因袭，作为传统文化负载者的士绅群体在近代演变的历史态势与趋向，在一代士绅之间的短短一二十年时间中显然还难以充分显现出来。同时，已出版的一些优秀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为了解清末士绅的演变提供了可资信赖的案例，但至今为止尚缺乏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学术界对晚清士绅看法的分歧，部分即是由于历史研究者侧重的研究区域或侧重的方面不一，难以反映出晚清士绅演变的群体趋势。本研究试图在时空上都放宽视野，在较广阔的时空背景中，系统地考察进入近代以来士绅群体演变的全过程，从中分析和探讨其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图较完整地展示传统士绅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演化流变的历史趋势和

群体态势。因而笔者使用“晚清”的时代概念为本研究考察的时间范围，大体上指19世纪中叶以来，必要时也追溯到更早一些时候。

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中，士绅群体也曾经历过几次大的演变（参见第一章第一节），但作为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中坚阶层的基本性格并无大的变化。他们在近代的不同于以前的若干变动，从根本上说是“近代化挑战”或西方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但他们回应挑战的方式，演变的迟速及程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因袭的传统以及其所处环境的制约；同时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他们的动态又反过来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进程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从传统与近代、个人与社会环境交互影响的辩证的视角着眼，本书对晚清士绅采取了多维的交叉透视。在研究内容上，则侧重于足以反映士绅群体态势的结构和功能的演变，较多地着墨于由士绅控制的地方文化教育、经济以及绅权组织和设施的发展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功能的变化。论述中，尽可能作统计分析以展示全貌，并辅之以个案描述提供足资信赖的例证，在尽可能客观地再现晚清士绅群象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与概括。

本书不是一个完全的比较历史研究，但部分地采用了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选择了日本幕末和明治时代的武士为参照系统。众所周知，士绅与武士在中日传统社会中，虽然都属“士”阶层，但二者分属于中日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中，其构成与社会职能均有差异，本书之所以选择日本幕末及明治时代的武士为比较参照系统，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是因为在中日两国的前近代社会中，士绅与武士同属于社会精英（elite）或支配阶层^[1]，在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中，他们的文化教养、政治经济地位均高于平民

百姓，在法律以及社会礼仪方面均享有特权，构成各自社会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支柱；其二是因为中日两国在大体上相同的历史时期遭受西方的冲击，两国的传统精英群体都开始了迈向近代的步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改革思潮的兴起，维新变革及革命运动的展开，士绅均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要角；而日本幕末及明治时代的武士，更是组织领导明治维新，创建日本近代国家的主力，以至有人说，明治时代是“士族之时代”^[12]。历史表明，在近代化挑战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的东亚，建立近代国家，领导和推动近代化变革的历史使命在近代化的初期非传统精英群体莫属，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士绅与幕末及明治武士承担了相同的历史使命。然而，同途而殊归，日本武士大体上完成了自己的近代使命，而晚清士绅却没有完成。因而，以日本幕末及明治武士为分析比较晚清士绅的参照系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解答本书的课题也是十分有益的。

传统精英群体向近代的演化与蜕变是一个再社会化过程，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教育和近代大众传播媒介对近代新知识与新思想的接受；其二是新职业及经济活动带来的经济地位的变动。传统精英群体作为社会及政治的领导层，上述变化必然反映到他们社会功能的转换，尤其是政治观念和政治角色的改变。在以下章节中，除第一章回顾和概述前近代社会中的士绅与武士，比较其差异外，第二至六章分别就上列各方面进行探讨：第二章讨论19世纪中叶以来团练与地方绅权的扩大，藉分析团练的结构与功能，并通过比较同一时期日本幕末维新武士力量的兴起与壮大，探讨19世纪下半叶中，士绅群体内还难以产生强有力的维新势力的原因；第三章论述自19世纪中叶以来至20世纪初年教育变革的历程，比较晚清士绅与日本幕末武士对西学东渐回应的迅速及

不同趋向；第四章分析士绅经济地位，注重于绅商合流问题，通过一些例证考察分析了清末士绅投资经营企业热对士绅经济地位的实际影响，并通过比较明治初年士族的经济状况，分析清末士绅经济地位变动有限的原因；第五章讨论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涉及到国内的立宪团体、谏议局与立宪派的构成、地方自治运动与绅权的变动，比较了士绅与明治士族在改造传统国家、创建近代国家中的不同作用；第六章论述士绅与辛亥革命，分析革命对地方绅权的影响，各地士绅在革命前及革命中对清王朝和革命的态度与动向，士绅群体的动向对各地光复以及辛亥革命结局的影响。最后一章是本文的结论，概论晚清士绅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在各章讨论的基础上，就晚清近代化变革受挫的原因，从人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作者的若干看法。

前言注释

- [1] 参见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译本），页26；《韦伯社会学论文集》，转见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introduction, p. 15.
- [2] 对绅权的讨论见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是书为吴晗、费孝通等历史及社会学者讨论论集，初版于1948年出版；费孝通先生关于士绅问题的论述，还有由美国学者英译与编辑出版的英文本 *China's Gent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关于“士”的起源，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页85—91；日本学者对士绅的研究，较早的论著有根岸佑：《中国社会的指导层——中国耆老士绅之研究》，平和书房，1947年出版。
- [3]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19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 Press, 1962.
- [4]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21, 211.
- [5] 柯文:《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新动向》,见《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页325—326。
- [6] 市古宙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页339, 345, 351。
- [7] Mary C.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1*,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0.
- [8] 如李侃:《清末士大夫思想演变的缩影》,《历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汪林茂:《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1年10月,武汉)。
- [9] 陈志让:《军绅政权》,页15。
- [10] 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页258—259,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1] 英文 elite 一词系指人群中的精华名流,中文有多种译词,诸如精英、领导阶层、上流阶层、秀异分子、英才、优秀分子等等,涉及士绅的英文论著中,elite 与 gentry 含义相近,常常混用。本书采用“精英”一词,用以表述 elite 所包含的概念。
- [12] 高桥哲夫:《明治士族》序

目 录

序	陈胜彝
前 言	(1)
第一章 前近代社会中的士绅与武士	(1)
一、清代的士绅	(1)
二、幕藩体制下的武士	(8)
三、差异的比较	(13)
第二章 对内忧外患的对策——士绅与团练	(18)
一、团练的兴起	(18)
二、“官督”与“绅办”——士绅与团练的组织	(29)
三、“攘夷狄而尊华夏”——团练的功能之一	(40)
四、“安民靖寇”——团练的功能之二	(49)
五、从团练看晚清地方绅权的变迁	(54)
六、绅权与近代化变革——与日本幕末武士比较	(60)
第三章 对西学东渐的回应——精英教育的变迁	(73)
一、早期的回应	(73)

二、姗姗来迟的教育变革	(87)
三、“学绅”与地方学务	(98)
第四章 绅与商——清末绅商透视	(113)
一、绅与商之间的社会流动——传统内变迁概述	(113)
二、开利权与兴商战——清末士绅的从商热	(121)
三、士绅、绅商、资产阶级	(131)
四、清末商办铁路公司剖析	(142)
五、“蜕变”的条件与环境——与日本明治士族的 一个比较	(155)
第五章 绅权与民权——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 	(168)
一、立宪思潮中的绅权	(168)
二、从谏议局看立宪派的构成	(177)
三、谏议局议员的政治角色——议案剖析	(186)
四、绅权与地方自治	(198)
五、精英群体与近代国家	(208)
第六章 士绅与辛亥革命	(221)
一、对革命的恐惧	(222)
二、对清朝的离异	(227)
三、城市士绅与各省光复	(236)
四、士绅与各州县的反正	(245)
五、小结	(251)

第七章 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	(255)
一、变异、分化与重构·····	(256)
二、演化的局限及其原因·····	(261)
三、中国近代化受挫原因的思考·····	(265)
征引书目·····	(270)
后 记·····	(281)

第一章

前近代社会中的士绅与武士

士绅与武士是中日两国中世纪等级社会中的“四民”之首，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在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了解他们在近代演变的起点，有必要回顾一下他们在此之前的概貌。本章即讨论士绅与武士作为中日前近代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内涵与外延，比较他们在各自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功能与特征。

一、清代的士绅

“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游士”，秦汉以后演变为士大夫，其传统一直延续不断，在儒家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士”在中国两千多年长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与每一时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及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1]，本书欲考察的士绅，是随着唐代以后门阀士族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士人群体。

在明清两代的官方文献中，士绅是一个在法律上明确区别于平民的特权阶层，但这一阶层具体包括哪些人，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解释不一。通常认为，士绅群体包括具有生员以上的各级功名及退休或其他原因在籍的官吏和有各类官职衔者。其成员主要

来源于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生员、贡生、举人、进士各级功名，这是所谓“正途士绅”；其二是科举之外的其他途径，诸如捐纳、荫、军功等获得监生或各类官职衔者，是为“杂途士绅”^[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生员与监生应排除在士绅群体之外，因为他们虽然有区别于平民的一些特权，但并不能进入仕途，仍是民的身份，被称之为“士民”，与贡生、举人、进士的社会地位相差甚远^[3]。这样，士绅只是指包括贡生以上的一个人数甚少的群体，与明清时代的历史文献中的另一个概念“缙绅”的含义相近^[4]。

本书把士绅主要理解为在野的地方社会中的精英群体，生员与监生构成这个群体中数量最大的成员。按张仲礼先生的划分，生员与监生构成士绅群体中的下层，区别于由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吏构成的上层^[5]。应当指出的是，贡生以上的高级功名的科举中试者在地方并非均匀分布，在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核心地区，可以动用较多的地方资源培养和扶持本地士人应付科举考试，他们考中高级功名的机会较多，而边陲州县的士人缺乏这样的条件，在高级功名的考试中的竞争力难以与前者匹敌，因而往往获得高级功名的人数甚少。但生员是以州县为单位有固定的学额，虽有大县、中县、小县之分，但其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广泛，遍及所有州县。因而从社会功能来看，边陲地区的生员、监生等下层士绅就可能成为当地的名流与领袖，发挥与核心地区的上层士绅同样的社会功能。孔飞立以士绅发挥社会功能的范围为据，根据“在不同层次的机构中的权力和特权”，把十九世纪的士绅分类为“全国性精英 (national elite)”、“省级精英 (provincial elite)”、“地方精英 (local elite)”，全国性与省级精英都是“大绅”，下层士绅显然排除在外，但在地方一级，尤其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下层士绅，甚至包括某些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平民，成为控制当地基层社会